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BEI
SONG
XIN
JIU
DANG
ZHENG
YU
WEN
XUE

萧庆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萧庆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本书系 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培养资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萧庆伟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6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02-003134-X

I. 北… II. 萧…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②政治-关系-文学-研究-北宋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953 号

责任编辑:陈建根

责任校对:陈建根

责任印制:周小滨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Beisong Xin Jiu Dang Zheng Yu Wenxue

作者:萧庆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3134-X/B.183

定价 18.00 元

序

吴熊和

北宋新旧两党因政见政策歧异,自王安石熙宁变法起,直至北宋灭亡,两党之争绵延六、七十年之久。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又多运用政治手段迫害政敌,不但使北宋政局大坏,也使文人命运饱经忧患。北宋中期的许多名家大家,几乎都卷入了这场党争。文学命运受政党政治影响之深之巨,可谓前此所未有。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对此,如果不作整体研究,而仅作个案研究,是不能得出科学结论的。我认为本书的贡献正在于对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全面而系统地整体研究,并从作者观察的若干层面进行了有益的剖析。

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从政党政治角度研究文学史的著作,也是一部对宋代文学作认真地专题研究并取得成功的著作。本书材料丰富,视野宽阔,立论坚实,文笔流畅,也是优点之一。研究宋代文学者,可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少的。希望庆伟同志以此为新的起点,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0年10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万叠银山寒浪起”，经济大潮的奔涌，不能不对学术研究有所冲击，然倘无学术之进取，则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将难以发展。鼓励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虽似逆水行舟却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不强调策划、不刻意编排，虽不成系统而又自成体系。丛书作者不分老中青，不问知名度；入选著作长可百万言，短可数万字，举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上有所创获而能成一家之言、并经专家评定认为合格者，即可列入本丛书。我们将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编好这套丛书，把真正的学术精品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已出书目)

- | | |
|-----------|------|
| 西游记漫话 | 林 庚著 |
| 神韵论 | 吴调公著 |
| 屈原论稿 | 聂石樵著 |
| 杜牧研究丛稿 | 胡可先著 |
| 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 张惠民著 |
| 文心雕龙研究 | 牟世金著 |
| 石头记脂本研究 | 冯其庸著 |
| 昭明文选研究 | 穆克宏著 |
| 庾信研究 | 林 怡著 |
| 唐宋词史论 | 王兆鹏著 |
| 道教与唐代文学 | 孙昌武著 |
|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 萧庆伟著 |

目 录

序	吴熊和 1
导 言	1
第一章 北宋党争的文化背景与特征	12
一 北宋党争的文化背景	12
二 北宋党争的特征	24
三 元祐更化与北宋党争的蜕化	37
第二章 北宋党争与北宋文祸	44
一 乌台诗案与王安石新法	45
二 车盖亭诗案与宣仁之诬	50
三 苏轼策题之谤与洛蜀党争	56
四 同文馆狱与私牍	64
五 张商英《嘉禾篇》案	66
六 元祐学术之禁	69
第三章 北宋党争与宋人诗话	77
一 崇宁禁书与宋人诗话之祸	77
二 苏、黄诗风之崇	84
三 苏、黄诗风之贬	96
四 宋人诗谥	100
第四章 北宋党争与文人仕履	112
一 熙宁、元丰：旧党放逐之始	112
二 元祐：旧党初次回归与初逐新党	116
三 绍圣：旧党再放逐与新党初回归	119
四 建中：旧党再度回归与新党再次放逐	123

五	崇宁:新党再度回归与旧党的第三次放逐	126
第五章	北宋党争与文人心态	132
一	高扬的参与意识	132
二	徘徊在参与与畏祸之间的党人心态 ——以苏轼为例	141
三	绍圣以来的文人心态	152
第六章	熙宁、元丰年间的文学	168
一	熙宁、元丰年间文学的主题趋向	168
二	熙宁、元丰年间文学风格的演变	187
三	熙宁、元丰年间文学馀话	205
第七章	元祐文学	209
一	苏门之立	209
二	苏轼诗文主题的不同趋向	217
三	黄庭坚诗的主题	230
四	苏、黄元祐诗歌的意义	237
五	元祐文学馀话	243
第八章	绍圣以来的文学	249
一	江西诗派的形成	249
二	苏轼的和陶诗	259
三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的晚期创作	272

附录一

北宋新党五人年表	289
----------------	-----

附录二

《清波杂志》中的新党诸人	335
--------------------	-----

参考及引用书目	343
---------------	-----

后 记	350
-----------	-----

导 言

文人同时充当政治和文学的主体,要数北宋为最,这在古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即为新旧党争。所谓北宋党争,是指由王安石变法而引发的新旧两党之争,它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终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①,历时五十馀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演变轨迹,即由政见之争转向意气倾轧。熙宁、元丰党争纯以政见不同而起,元祐党争虽以政见之争为主要,但其意气用事的一面却开了此后党争转入意气倾轧的端倪,以至于绍圣以后党争直衍为党锢之祸。而无论新党中人抑或旧党中人,他们大多是经由科举而入仕的文人。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②已明确说出北宋党争与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当日文学风貌的形成和演变轨迹的。

熙宁、元丰党争与庆历党议殊为不同。不同处在于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具有一种因政见相左而形成的党派意识。由于对新法的看法不同,士大夫群体渐次判分为新旧两党,元祐更化之

① 是年二月,诏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见《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它标志着哲、徽二帝绍述之治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北宋新旧党争的终结,当然,其回响仍见于南渡高、孝二朝。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编第十九章《政党政治》,第516页。

治,致使旧党一系分化并组合成洛、蜀、朔三派,这些都是古代中国政党政治萌芽的表现形态,其中蕴含着当日士大夫群体所普遍具有的一种党派意识。这种呈对立状态的党派意识及其表现形态,并不存在于庆历新政之中。假如说在庆历革新之际,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尚且具有一种“君子有党”的党派意识,但是作为其对立的一面即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反对派在那时却未能产生,如夏竦“怨(石)介斥己,又欲因以倾(富)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习成……且伪作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于朝”^①。可见,夏竦反对范仲淹、富弼,并非出于某一政见,而只是因为石介曾经指责和排斥过自己。即使如此,夏竦也未能因反对范仲淹而组成另一政治派别。所以说,熙宁、元丰党争有别于庆历党议就在于它具有呈对立状态的党派意识和呈对立状态的政党政治的表现形态,而这是一种重要的近代指向性因素。本文不把庆历党议列入北宋党争这一概念中,即有鉴于此。

熙宁二年是我们研究北宋党争与文学之关系时所界定的上限,但在实际考察中则无论新旧党争抑或当日文学,我们都将溯源至于仁宗庆历之世。这是因为:熙宁、元丰党争与庆历党议虽多所不同,但熙宁、元丰文人却继承了庆历文人感激论事的参与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北宋党争虽因王安石变法而起,但却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背景即庆历之际儒学的复兴。庆历之际儒学复兴的要义在于要改变此前蔓延已久的因循墨守之风,而倡导一种经世致用的社会风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即标志着北宋儒学的复兴已获得成功。感激论天下事、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遂成为当日士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

人的普遍风尚。庆历新政即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产物和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反映。熙宁、元丰新政是庆历之际经世思潮延续之下的产物,而卷入熙宁、元丰党争的文人也大多是在庆历士风的孕育和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麇杂其间”^①,即因庆历之际文人参与精神之延续所以致之。有鉴于此,庆历以来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志在当世的文人精神,将成为我们研究北宋党争与文学之关系的基本线索,换句话说,我们所要考察和讨论的是:随着新旧两党从政见之争到意气倾轧的转化,庆历以来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志在当世的文人精神将如何演变?这种演变将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怎样的变化?

本文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一是非文学研究,二是党争与文学之中间环节即文人心态的研究,三是文学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和描述北宋熙宁以来文学的外部因素或外部环境。首先,我们对北宋新旧党争这一政治现象作了专门的探讨。北宋儒学至庆历已然复兴,复兴后的北宋儒学以经世致用为本,它既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元丰新法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交争的文化背景,这当然是就熙宁、元丰、元祐党争而言的。由于文人充当了熙宁、元丰、元祐间政治运作的主体,因而决定了熙宁、元丰、元祐党争以文人士大夫为限的首要特征;又由于熙宁、元丰文人在庆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党派初立之始,党人各陈政见,以为经世方略,并无倾轧之弊。而这正是古代中国政党政治业已萌芽的反映。绍圣以后,原本纯洁的政见之争转而为意气倾轧,乃源于元祐党人对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对

① 《中国文化史》第二编第十九章《政党政治》第 519 页。

立范畴的严格区分。这一区分使得他们自己与熙宁、元丰党人分别处于绝不相容的两个极端。邵伯温曾经说过：“刘摯、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馀，然嫉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貽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①元祐党人对君子和小人的严格区分，遂至于“嫉恶太甚”，绍圣、崇宁党祸其来有自，宜其然矣。

其次，我们描述了北宋党争与北宋文祸之间的关系。北宋熙宁以来的文祸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始终与新旧党争密切关联。与北宋党争由政见之争转入意气倾轧一样，北宋文祸也经历了一段相应的演变历程。元丰乌台诗案虽以苏轼“好骂”之诗而成，但新旧党人之间并未由此至于交恶的地步。苏轼遭遇乌台之勘后仍与新党中人王安石、章惇等互有文学交谊，即可说明这一点。至元祐车盖亭诗案，已有以人废文之嫌。蔡确《夏日登车盖亭》诗“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时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②。之所以构祸，是因为其“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的行迹，或者说是元祐党人严于君子小人之分的观念的产物。绍圣以后，文祸皆以党人意气倾轧而成。或以私牒起狱，如同文馆狱；或诏禁元祐学术。元祐学术之禁，意味着新旧党争已发展到了文学交恶的地步。绍圣以来新党的意气倾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元祐党人的全面报复一面，而且在其内部也体现了出来，最著者为张商英《嘉禾篇》案。以士人文字之作为党人倾轧的工具，已是绍圣以来文祸最为显著的特征。

北宋文祸之烈，亦波及于诗话一体。诗话之体，原本宋人“集以资闲谈也”^③，但在北宋新旧党争、尤其是在两党意气倾轧

① 《宋史》卷四三三《邵伯温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戊寅条。

③ 欧阳修《六一诗话》。

的情势下,也或深或浅地受到冲击。或遭遇禁毁,如刘放《中山诗话》;或撰者未敢著录元祐诸公诗话,若阮阅《诗话总龟》。但更为常见的是在苏、黄诗风一端所折射出的崇贬倾向。苏、黄诗风的推崇,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诗话撰者多为苏、黄门人,二是南宋前期同情或支持元祐政事、学术的政治倾向和文坛风气。苏、黄诗风的贬抑,主要见于新党中人所撰诗话。这类诗话最重要的特征是不录元祐诸公诗事,即使偶有论及,亦多不满之辞。当然,其中也可能是魏泰、叶梦得等人原本就不喜欢苏、黄诗风。但在绍圣以后,元祐学术遭遇禁毁,魏泰、叶梦得不录苏、黄诗话或不满苏、黄诗风,当与此有关。

北宋新旧党争是当日文祸产生的背景。而当日文祸的蔓延则进一步表明了新旧党争与文人的密切关系。文人既与党争密切相关,则其仕履也不能不受制于它。新党在朝,意味着旧党的放逐;而旧党执政,则意味着新党贬逐在外。无论新党中人抑或旧党中人,都有过两次“从放逐到回归”的经历。旧党文人从放逐(熙宁、元丰)开始,至元祐回归,这是第一个回合;从放逐(绍圣)到回归(建中),这是第二个回合。新党文人则以在朝(熙宁、元丰)开端,其后两度放逐(元祐、建中)、两度回归(绍圣、崇宁)。要之,自熙宁以来,文人仕履大体表现出“放逐——回归——再放逐——再回归”的整体特征。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新旧党争与党人文学之中间环节即卷入党争的文人心态。伴随着当日文人“放逐——回归——再放逐——再回归”的生活历程,其心态也呈现出相应的演变轨迹。新法之初,文人多有高扬的参与意识。这是庆历之际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参与意识,首先表现在当时文人都有一种变革意识。革新时弊是庆历以来许多文人士

大夫的普遍要求,“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①。其次表现为文人积极参与的行为方式。就苏轼而言,或“数上书论天下事”,或“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②,都可以看作是熙宁初苏轼参与行为的主要方式,即如新法之初,“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③的诗歌创作,也是苏轼参与行为的一种表现。此后,随着外任和贬逐生涯的到来,文人高扬的参与意识遂渐有削弱,并转而为既欲参与、又畏祸及的两难心态。苏轼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自熙宁四年外任州郡起,苏轼即有了徘徊在参与与畏祸之间的矛盾心态。谪黄州期间,畏祸有甚于前,但仍有“复入于道德之场”^④的愿望。元祐还朝以后,苏轼虽身处要津,却仍欲回避社会。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中有云:“我宋人才盛元祐,玉堂人是雪堂人。”^⑤正说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却不能摆脱黄州之贬所带来的心理阴影的一面。苏轼“要作平地家居仙”的处世理想便是在这一矛盾的心态中产生的。

绍圣之后,对政治的恐惧和对个体生命的忧虑,是元祐党人共同的心理背景。但由于文人性情的差异,以及对政治恐惧和生命忧虑的处理方式的不同,所以其心态也各具特征。秦观“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⑥,故心态趋于悲苦不振。苏轼虽远迁岭海,但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⑦,加上居黄州间心理经验的积累,所以其心态转以超然物外、身心俱安为归。苏辙的心态既不同于秦观的悲苦,也与苏轼的超然物外相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11页。

②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③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④ 《苏轼文集》卷四十八《黄州上文潞公书》。

⑤ 《梅溪后集》卷十五。

⑥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

⑦ 《苏轼文集》卷六十《与子由第十首》之三。

异。苏辙能以佛老自遣，故无秦观之悲苦不振；然其始终沉缅于佛老而不能自拔，所以旷达不及乃兄苏轼，而颓废则远远过之。

第三部分是文学研究。主要讨论党争影响之下的文学风貌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文学分期的问题。文人的仕履特征、心态趋向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作面貌，是本文进行文学分期研究的主要依据。我们把北宋党争影响之下文学发展分为熙宁和元丰、元祐、绍圣以来三个阶段，即由于此。可以看出，这一划分并不完全局限于文人“放逐——回归——再放逐——再回归”的生活历程。熙宁初，是新旧党人力争新法的时期，而熙宁中末迄于元丰末年，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旧党文人补外与放逐的时期。熙宁、元丰文学便产生于此种背景中。元祐间旧党在朝的经历，以及文人虽在朝而仍欲回避政治的两难心态，是元祐文学的主要背景。绍圣与崇宁之间，元祐党人虽因建中之治而一度回归，然为时甚短，加上元祐党人皆已垂老和向太后无意于重用苏轼、苏辙等人，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绍圣、崇宁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惟其如此，本文“绍圣以来的文学”之研究遂不受此次回归的局限。

探讨新旧党争影响之下的文人创作的主题趋向和风格演变，是本文第三部分即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而本文熙宁和元丰、元祐、绍圣以来三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上已勾勒出当日主要文人的创作主题和风格演变的轨迹。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卷入新旧党争的文人大多是在庆历士风的孕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庆历以来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志在当世的文人抱负，是本文考察和讨论新旧党争与文学之关系的基本线索。

熙宁、元丰文学的前半段即熙宁年间的文学创作最能体现庆历以来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文人志在当世的宏远抱负。这在熙宁、元丰两大文豪王安石和苏轼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轼、王安石对杜甫忠义人格的推尊和汲取、王安石旨在经邦济世的创作内容、苏轼讽谕新法不便的诗歌以及因新法不便而在诗歌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和同情,都是二人熙宁年间创作主题即当世之志的表现。这一主题的削弱,是在熙宁末元丰初,时王安石退居金陵,苏轼始遇黄州之贬。由关注政事转向山林渔樵,是二人当世之志削弱的主要标志,也是二人创作的共同倾向。与创作主题的转移相一致,王安石与苏轼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王安石而言,是由豪健恣肆转向寓悲壮于闲淡;就苏轼来说,是从豪健转向旷远。

元祐年间,文坛几乎全为苏轼及苏门弟子所独占。其间,苏轼作为当时“文宗”的地位虽然仍在,但创作成就则不如熙宁、元丰年间^①。同时苏门文人亦已崛起,如诗坛有苏、黄之并列,词坛则“今代词手,惟秦七(观)、黄九(庭坚)尔,唐诸人不迨也”^②。虽然如此,苏轼与黄庭坚仍足以代表元祐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朝以后的苏轼,其心态仍徘徊在参与与畏祸之间,并由此带来其诗文创作主题的不同趋向,即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散文来表达其“庶有补于国”的创作目的。散文(主要指章议奏疏)创作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还朝以后苏轼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臣而不言,谁当言者”^③的参与意识,源于苏轼受恩至深的心理(指宋神宗的保全性命之恩和高太后的非次拔擢)。而苏轼此间诗歌转入题画与唱和二途。这标志着苏轼元祐诗歌创作已经偏离了熙宁

① 苏轼在翰林与刘敞书云:“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与刘贡父七首》之七)苏轼元祐创作成就不高,大约也与其诗情文思的滞塞有关。

② 陈师道《后山诗话》。吴熊和师谓陈师道此论“是指元祐时期而言的”,见《唐宋词通论》第216页。

③ 《苏轼文集》卷二十八《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以来“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的传统作风。元祐四年，苏轼外任杭、颖、扬、定诸郡，诗歌创作虽有别于在朝之日，但与熙宁补外期间相比，其激切论事、无所回避的精神也低沉了许多。个中原因，仍在于其无心进取与畏祸及身的心态。和苏轼一样，黄庭坚诗也转入题画（含题物品）与唱和二径。元祐年间，黄庭坚虽处顺境，但其熙宁、元丰以来已有的归田退隐之思想并未消失，反而有滋长之势。如果说题画诗也表达了黄庭坚“不下堂筵，坐穷泉壑”^①的审美需求，那么题物品诗的盛行，则表明诗人未能或不能脱离这个以具体物质为标志的现实世界。二者看似矛盾，实统一于黄庭坚立足现实生活而又渴望摆脱尘世羁绊、获得身心自由的处世心态。其中所流露出的心态变异和主题趋向，是与苏轼相吻合的。

题画诗与唱和诗虽同为苏轼、黄庭坚当世之志的消解的产物，但由它们传递出来的意义却不能被忽视。旨在应酬的题画诗与唱和诗，是与诗艺切磋、诗艺竞胜联系在一起的。宋诗为后人褒贬不已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就是在元祐唱和诗风盛行的背景下得到加强的。

绍圣以后，苏轼及其门人诗词创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忠君思想的蜕化，意味着苏轼当世之志仍在继续消解。隐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的旷真怀抱，至此已成为苏轼主要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苏轼开始崇尚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特征。这一揭明标志着苏轼从陶潜“为人”到诗歌风格的追求的完成。而岭海间所和陶诗则是苏轼这一审美追求在其实践创作中的主要的表现形态。就苏轼和陶诗本身而言，其风格也表现出从豪气不除到平淡闲远的演变趋向。因而，和陶诗的出现，标

① 郭熙《林泉高致集》之《山水训》。